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

萧国亮 著 袁 方 审定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密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5.375印张 插页2张 114,000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011-1534-6/G·547 定价: 3.10元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东方影视集团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

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

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

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

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家争鸣，我

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这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羡林
前言	1
第一章 从秦始皇说起 —— 皇帝专制的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与特点	7
一. 从王权到皇权	8
二. 放大的家族	13
三. 全能主义的国家	18
四. 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	23
第二章 被土地束缚的经济	29
一. 地租的秘密	29
二. 小农家族经济结构	37
三. 竞争与垄断	44
四. 小农家族经济结构的特征	48
第三章 “皇恩浩荡” —— 皇权与 农业经济	63
一. 精耕农业的平衡机制	64
二. 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的	

调节器	65
三. 治水	69
四. 救荒	71
第四章 皇权支配下的手工业经济	81
一. 官营手工业	81
二. 控制匠人垄断资源	84
三. 精湛的技艺低下的效益	87
四. 夹缝中的民营手工业	90
第五章 皇权与“抑商”	93
一. 商鞅与抑商政策	94
二. 问盐铁要钱	96
三. 禁锢市场发育的三大绳索	103
四. 奇异的交换与不完全的 商品经济	108
五. 怪胎——官商	112
第六章 吞噬剩余劳动的机器——皇帝专制 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	117
一. 赋税: 皇权窃取财富	117
二. 徭役: 强权支配劳动	121
三. 土贡: 权力魔术	124
四. 贪污: 分享余沥	126
五. 寄生赘瘤	129
第七章 专制国家与经济发展	131
一. 走马灯: 皇权兴衰与经济周期	131
二. 城市: 结构二元化	137
三. 单向流动的城乡关系	147

四、侏儒症：“资本主义萌芽”.....	150
后记	李生泉 157

前 言

当人们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后，便会感觉到不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就难以深切地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一旦进入中国经济史领域，又会渐渐体会到在中国没有任何纯经济的现象。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在真实的历史图景里，是水乳交融，难以区分的。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确切地说，就是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及其官僚政治体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干预，是如此之深刻，如此之广泛，如此之长久。

事实上，一旦为了理解当代经济而追溯到经济历史之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涉入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因为，如要揭示经济历史的发展线索，就必须去了解经济事实与非经济事实的相互联系，进而去了解经济发展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这是社会科学，精确地说，应是经济科学的认识规律。

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在经济研究工作中所出现的许多根本性的错误，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学家缺乏理论修养，而是缺乏史学修养和历史知识，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的知识；而经济决策的失误，其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依据了错误的理论或对正确的理论缺乏深切的领悟，而是在于缺

乏对国情的深刻认识，在于没有注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因此，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应当了解经济史和社会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社会史。

当然，对中国经济史与中国社会史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可能要贯穿于一个学者的终生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按史学界的现成概念，把自战国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二千多年历史，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但是，当研究深入以后，特别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探索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并进行中西比较以后，便会发现使用封建社会的概念是多么地不确切。所以，本书抛弃了这个概念，而代之以中国传统社会。

把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后，中国史学界的一种概括方式。这种概括方式，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把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呢？对于这个问题是必须加以认真探讨的。马克思囿于他对中国历史了解的局限，并没有明确论述过自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是封建社会。其实，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东方社会（包括中国）与西欧社会的发展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线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三页。

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① 在此书中，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时，除了论及“公社的各种形式”、“原始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之外，还专门考察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②。从上述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并不以为世界各国的历史都必须依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线索发展。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亚细亚所有制这一系列概念，正表明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同一的发展模式。

由此看来，认为自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是封建社会，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而认为这段历史并非是封建社会，也未必违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把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说成是封建社会，这里的“封建社会”，并非是西周“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③的意思，而是英文 Feudal Society 的译名。作为 Feudal Society 译名的“封建社会”，是产生于十九世纪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概念，是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加以概括后所产生的一个概念。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在内）对作为社会制度层面的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是有明确界定的。尽管他们在作界定时各有不同之处，但大体上都强调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〇九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册，第四七〇—一四九三页。

③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下三方面的内容：“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制相适应的封土制度；三、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①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封建主义或封建制度这一概念时，大体上也是涉及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② 总之，作为社会制度层面的封建主义这一概念，是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加以概括的产物。这个概念具有其特定的含义。

假如自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其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符合上述的封建主义概念的三方面内涵，那么我们不妨把这段历史称为封建社会。但是，事实上，自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其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与欧洲封建主义社会大相径庭。从社会关系方面看，中国的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租佃契约上的关系，中国的佃农对地主很少有人身依附关系。而臣民与专制国家的关系，除了服徭役之外，也很少有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国，不存在像欧洲封建社会那样的封君封臣关系。从经济方面看，中国也不存在封土制度。中国的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土地所有权处在不断的流动过程中。不是像欧洲封建社会那样的领主制经济，而是小农家族经济。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存在着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权力

① 马克思《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六四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七八五页。

并不像欧洲封建社会那样处于衰落状态。军事、政治、司法权始终集中于中央集权国家，而地主根本不像欧洲领主那样拥有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司法权力。上述事实表明，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根本无法涵盖自战国至清代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所以，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硬加于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之上，实质上是用欧洲模式强行裁剪中国历史。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是欧洲中心论的反映。

对此，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外来书籍文字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所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他们其实假定着文化到处都是相同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本身，在我们看来，就是需要加以事实证明的。而且这假定根本就抹煞了加以详细研究的必要。若是我们一定要一个假定的话，不如先认为文化并不是到处都相同的，因为是不相同，所以我们推究它们不同的地方，而同时，亦不敢随意接受不是从本土事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这样我们可以不必和人家争论中国文化现象是否尚处在封建阶段或是半封建阶段，我们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实地详细它”^①。这段话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学家对三十年代中国史大论战的一种批评。费孝通教授在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中，把自战国至清代的这段历史称为传统社会。“绅士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之后，

① 费孝通《伦市寄言，关于实地研究》，载《益世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

中国传统社会中所特具的一种人物。”^①中国传统社会这个概念是适合于概括自战国至清代鸦片战争前的这段历史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的。所以，以中国传统社会这一概念取代封建社会的这个概念的同时，为了更确切地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特征，本书用“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概念取代了史学界惯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有些地方，为了行文方便简称为皇权及其专制国家。

① 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神权》第一页。